



李叔青



医生

Doctor
Li Shuqing

吴秀良 著



李叔青



医生

Doctor
Li Shuqing
吴秀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青医生 / 吴秀良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8-1412-9

I. ①李… II. ①吴… III. ①李叔青 (1875 ~ 1908) —传
记 IV. ①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970 号

李叔青医生

作 者 吴秀良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7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12-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吴秀良教授治清史、中日关系史，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多年，功力深厚，触角敏锐，见解独到。例如对于清代皇帝雍正所作的评价，独树一帜，不落俗套。在近代基督教史此一领域中，吴教授近年用功甚勤，所用之心力也最多，原因不单是学术兴趣，也出诸个人的宗教情怀。尤其是对于近代中国的布道家和奋兴家的研究，更是孜孜不倦，不惮辛劳。他到处搜集资料，包括当事人及其后裔的日记、相片、手稿等，先前已经完成了女布道家余慈度的传记，现今又撰成《李叔青医生》，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填补了重要的一页空白。

我自己对李叔青认识不多，但很早就从不同的途径听过他的名字。首先是我在 30 年前研究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ng J. Allen）时，就接触到苏州的李氏家族。李叔青的父亲李子义是苏州博习书院的学生，而博习书院则是美南



监理会建立的一所学校。其次，我在中学时代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到过不同的教会，也听过不同的布道家和奋兴家的讲道，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几位名牧包括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而赵世光和李叔青的渊源甚深。再者，我的一位史学界同行和朋友是李中清教授，他是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儿子，而李政道正是李子义次子李仲覃的嫡孙，也是李子义三子李叔青的侄孙。这种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和历史渊源，叫我读到《李叔青医生》初稿时即手不释卷，津津有味。

我对李叔青生平事迹发生兴趣，当然也不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关系。李氏的一生，如果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脉络去看，也会令人产生许多启发。他不只是一位有名的基督教布道家，影响了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教会名牧和基督教领袖，如上文提及的余慈度、赵世光等，也在中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上，扮演着一个牵引和配合的角色。举例来说，他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医疗学校——北洋西医学堂——的四届毕业生，在近代中国医疗史上有其一定的位置。他和他的家族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徘徊，在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挣扎，在传统文化和科学教育之间的选择，就是一本很有意义的近代中国文化史。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暨历史学讲座教授

序二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一段史无前例的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过程，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变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影响或贡献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冲突缘由如何，中国官府、绅士、民众对基督教的回应怎样，中国基督徒和教牧人员的成长和作为等主题，一直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的问题。不过，在过去 30 年里，大陆学者基本上是把与基督教来华历史相关的问题，置于中西文化交流或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因而，研究和讨论比较偏重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对传教士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积极贡献方面，尤其是现代教育、医学、新闻、出版、印刷、慈善等各项事业的引入和推广的研究较多，对传教活动在各地引发的教案、对基层社会变迁、



对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和对本色化运动的研究较多。相对而言，对来自西方诸国不同传统的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的多种形态、传教士群体自身的品格、传教士对中国基督徒品格陶成、对中国传道人和牧师的培育、传教士与中国传道人和牧师的交接的研究著作则较少。对中国基督徒、牧师和传道人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的专项研究，仅有对赵紫宸、吴雷川等个别有著作传世，以及关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基督徒教育家的研究著作问世，对其他人的研究则很少。如今，吴秀良先生的《李叔青医生》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

我与吴秀良先生 2001 年相识于美国波士顿，而且荣幸地获得吴先生馈赠的《余慈度传》，知悉他对研究中国福音派传道人情有独钟。近日，本人饶有兴趣地拜读了吴先生的近作《李叔青医生》，深受启发。虽说该书与学界一般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观不同，是以基督教神学史观撰写的一部作品，但它以自己的视角向读者呈现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一位中国基督徒传道人李叔青皈依、成长、献身的心路历程和曲折经历，用吴先生的话说就是蒙召和服事的业迹，以及他对亲朋好友的耐心和热爱，使读者有机会对 20 世纪初中国基督教复兴运动有所了解，对李叔青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多样性存在有所认识。《李叔青医生》的注释虽说不是很多，但通过伍伯瑞教士一家的故事和“义人的后裔”一章，读者可以看到作者为撰写这一著作走访各地、查询资料、清楚地

厘清相关人物的亲属关系和脉络等，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吴先生在耄耋之年完成此作实在值得敬佩。书中提到的美国基督教奋兴运动布道家穆迪、穆德，中国基督教布道家丁立美、倪柝声，以及天津守真堂、上海慕尔堂、守真堂，还有义和团事件、天主教神父对基督教牧师的救助等人物及其相关事件，都可能激发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兴趣，从而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发展。据悉，吴先生还将为多位中国基督教人物立传，希望不久能拜读到先生的新作，也盼望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其他空白得到填补。

王美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

追寻被湮灭的历史人物

笔者在《余慈度传》^①中曾经指出，李叔青医生是20世纪中国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个奋兴布道家。他的得救和兴起源自西方差会（Missions）医疗服务的布道策略，而中国第一个国立医学院——北洋西医学堂——在天津得以建立就是这一布道策略最成功的例子。李叔青是1892为北洋西医学堂所招录的第四届医学生。在他就读期间，上帝差遣了美国宣道会教士约翰·伍伯瑞（或译伍约翰）夫妇（John and Katherine Woodberry）于1895年来到天津从事布道工作。李叔青从伍氏夫妇听到纯正的福音而重生得救以后，就又带领了以张汝舟兄弟二人为首的同班同学们归向基督。笔者写完《余慈度传》后，又立即从事追寻有关李叔青的事迹，以期对这一位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奋兴布道家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1999年，承蒙于力工牧师惠赠他的自传《夜尽天明》，笔者从该书中得知于牧师的母亲也是因参加李叔青在烟台的奋兴布道会而得救的。以后笔者又先后读到于牧师在《导向》杂志中发表的《李叔青小传》和李渊如在《灵光报》刊登的《李叔青行述》。从文章里，笔者得知他们的资料都是源自李叔青家人所刊行的《李叔青传》。该书由上海广学会于1934年出版。编者就是李叔青的二兄李仲覃。但由于该书是以一种独特的白话文体所写，编者在述说李叔青事迹的同时，常常插入许多“说教”（讲道）性的段落，占用了大量篇幅，因此我们从该书中只能筛选到数量有限的“骨干性”史实，而无法得到“血肉性”的重要资料。为了能看到李叔青和他的同工们（特别是张汝舟弟兄）比较丰满的全貌，笔者开始沿着两个方向去从事资料追寻的工作。第一个是试图从已刊和未刊的中英文资料中去搜寻（中文资料非常稀少）；另一个是对李叔青和张汝舟（自然也包括约翰·伍伯瑞）在世的后裔们的采访工作。

在英文资料里，笔者首先遇到的难处就是当事人英文名字的拼音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文档案里，中国人的名字的拼法还没有使用像现在全世界通用的汉语拼音系统。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传教士所发明的“韦氏”（Wade - Giles）拼音系统，但是当时的英文资料中很少有人使用。因此，笔者必须凭着直觉和基本的语言学常识去鉴定某个英文



名字是不是要找的人。第二个困难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名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个“名”，还有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号”。不但如此，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也常常把三者混用，因此读者就会把一人当做两人或三人！试看李仲覃如何在《李叔青传》里介绍他的弟弟李叔青。他对读者说：“请看上帝现在选召的，这位福音使者，就是姓李，名延生，字应柳，号叔青，江苏省松江府南汇县人。他的父亲，是监理公会的牧师，号子义。”这里李叔青的名字三者都有：“名”延生，“字”应柳，“号”叔青。然而提到他们的父亲，却无“名”无“字”，只说他的“号”是子义。不但如此，在英文档案里，中国人的“名”常常只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代替而不全拼。如果根据中国南方方言的发音拼出来的名字，对我们研究者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例如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里，李叔青的名字的拼法是 Y. S. Li；这里用的是他的“名”延生英文拼法的两个开头字母“Y”、“S”，而不是用他的“号”叔青。同文中他妹夫的英文名字是 Dr. B. Y. Wong。如果根据广东方言拼写，“Wong”应当是“黄”；而“B”和“Y”代表什么汉字就更无法确定（幸而2010年秋本书繁体版在台湾问世后不久就从罗元旭 [York Lo]^②先生得知他的全名应当是“王培元”而不是“黄培元”）。至于张汝舟和他兄弟的名字在《教务杂志》里是“Dr. Y. S. Chang and his brother

Dr. Y. S. Chang”。我们可以确定“Y. S.”应当是代表“汝舟”；但是“Y. J.”中的“J”就无法确定，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兄弟的名字（幸而后来笔者查出他叫“汝川”）。

因此，就本书的性质和内容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本《李叔青医生》就是笔者对《李叔青医生》的一个超长的“注解”。这个注解是由《李叔青医生》中骨架性的事实、笔者在中英文档案中所查到的史实以及对当事人家族访问所得的资料融合而成的。这个艰难的追寻过程虽然费了笔者5年多的时间，但是最后向读者所呈现出来的成绩，却不过是这一本不起眼的小书而已！因此笔者心里有时难免会感到一种“何苦来哉”的挫折感！

但是另一面，在访问本书主角人物后裔的过程中，笔者也曾获得不少令人鼓舞的成就感。第一个例子就是于力工牧师给笔者的一封信（1999年10月5日）。于牧师在他的信中告知笔者说：“Woodberry 有一孙子在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差传学院工作。”笔者查到 J. Dudley Woodberry（达礼·伍伯瑞；本书简称“伍达礼”）的名字后就发电邮问他说：“我发现你的姓和我所研究的一个约翰·伍伯瑞教士相同，请问你和他是否有亲族关系？因为我正在追寻与他有关的事迹。”他立刻回复：“是的，伍伯瑞是我的祖父，我的儿子罗伯特（Robert）现在正在上海，他去那里是要考察我祖父在上海所建立的守真堂。他回来以后我会叫他和您联



系。他可以供给你资料。”不久罗伯特回来，立刻连续为笔者提供了他手头的资料，还有他刚从上海拍摄的守真堂旧址和一位年纪老迈的守真堂女会友的照片。另外还提供了宣道会总部有关守真堂的档案资料，并且把他住在华盛顿州的姑姑凯瑟琳·伍伯瑞（拉森夫人）（Katherine Woodberry Larson）介绍给我。凯瑟琳接到我的电话时，非常兴奋地说：“你知道吗？我的中文名字叫伍凯真。我是代表基督的凯旋和真理啊！”她为笔者提供了1924年和1925年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包括凯瑟琳自己（婴儿时期）、她父母和祖父及守真堂的中国同工们（包括赵世光牧师。她祖母老凯瑟琳已经于1921年逝世）。



罗伯特与守真堂老友合影

在追寻李叔青后裔的过程中，笔者也同样获得令人鼓舞的协助。当笔者以电邮和李仲覃嫡孙李政道教授取得联系后，他为我提供了李仲覃去世时圣约翰堂（东吴大学的教堂，属美国监理会）全体信徒为和所立的纪念碑碑文、李仲覃在2001年刚出版的《老苏州·百年历程》一书中李仲覃的照片和圣约翰堂全体信徒珍贵的合影。这些资料大大帮助了笔者对李叔青和他父兄间关系的了解。2009年年底刚出版的《李政道传》，使笔者获得了更多关于李叔青的家族资料。另外在《李叔青传》里也附有他去世后的全家福照片（应



前排由左至右：老约翰·伍伯瑞（抱伍凯真）、宣道会远东会督（Rev. D. W. Le Lacheur）、王医生（B. Y. Wong）。最后一排正中为俄尔（其他都是华人同工）。第二排：穿黑衣者是俄拉，伍尔素在她左边（中间一位是华人同工），伍尔素右后方是钟保罗。根据伍凯真（照片中的小女孩）致笔者信函说，这张照片是1925年“五卅惨案”事件刚刚过去后拍摄。



当是该书于1934年出版前不久照的)。照片上除了他夫人温氏和孙子孙女外,还有他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配偶。笔者曾在本书2010年的繁体中文版中说:“目前对于李叔青的第二、第三代后裔的情况仍有继续追寻的必要。”但笔者于该书出版后不久,就从李叔青的曾孙李鸿捷(Roger Lee)^③先生处获得李叔青家族的完整资料。(参附录一)

至于张汝舟兄弟和其后裔的情况,笔者追寻的过程则比较顺利。因为笔者早就认识他的嫡孙张振融(Daniel Chang)和外孙女鲍张贤玲(英文名字是Katherine,也是采用了老夫人的英文名字Katherine。她曾在上海守真堂学校上学,约翰·伍伯瑞的两个女儿都做过她的老师。)另外,笔者也得以和张汝舟同父异母的六弟张汝励的子女们取得联系。张汝励(1912年生)于1990年去世。当笔者2004年到上海访问他夫人和女儿张力时,她夫人已经瘫痪在床,形同植物人,不能讲话了。但是笔者从他住在福州的儿子张帆那里获得不少珍贵的家族史料。至此,笔者终于可以把张汝舟兄弟和他们后裔的情况描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图画。最后,在追寻张汝舟后裔的事迹期间,笔者也无意中发现了张汝舟的长辈和倪柝声家族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发现了张汝舟大妹张美珍和宋尚节家族的关系^④。

笔者在这里必须声明:之所以花了众多年日,力图把这三个家族的相互关系考察清楚,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无谓的好

奇心；而是试图从这三个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家族中间，找出上帝如何借着他们的先祖们启动 20 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轨迹，从而继续观察他们的后裔如何继承了他们先祖爱人无私的崇高美德、继续为中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这些发现应当成为我们后辈蒙恩者的鼓励和借鉴。因此笔者将在该书第二部中，对这些“义人的后裔”加以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李叔青于 1905 年年底辞去东吴大学的教职，全时间致力于复兴布道的工作。不过他以全时间致力于教会复兴的工作前后还不到 3 年！他只活了 34 岁，于 1908 年 8 月积劳而终。但是李叔青的复兴职事（和他的同工余慈度一样）却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第一，李叔青在 1895 年得救后，立刻向同学传福音。他带领了三分之二的同班同学蒙恩得救。他在中国教会历史中，被公认为“校园工作”的鼻祖。于力工说：“抗战期间上帝用赵君影牧师，兴起了大学生工作。在他未回天家之前，我曾去拜见他询及当年我们同工一些资料。他曾提到，过去做学生工作的，首推李叔青先生，继之丁立美牧师。”^⑤并且他还和得救的同学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界性布道组织——天津守真堂布道团。这个布道团队比 1908 年长老会牧师们在山东成立的远东布道会早 10 年；比蔡苏娟等 1918 年的中华国内布道团早 20 年^⑥，而且他们的团队参与的布道范围还扩展到海外地区，包括远东的日本、



南美的巴西和中东的耶路撒冷。他们堪称中国教会历史上校园团契、家庭教会和海外宣道的先行者！第二，虽然李叔青口才平常，低调的布道风格都远不如以后三四十年代宋尚节和计志文那样的多彩多姿，但是正如新约的施洗约翰一样，李叔青的确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福音使者”（李仲覃语）；他是上帝用以启动 20 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声”。不但如此，他和他的同工们所结出来的属灵果子，继承了他们属灵的遗产和动力，为了上帝在 20 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的奋进和壮大都展示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西方宣教史上有一句名言：“中国的福音之门是西方的医生教士用他们的手术刀撬开的。”同样，为我们把这部《李叔青医生》拉开序幕的人物也是两位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而献上宝贵生命的“西医教士”。